

铁托 内幕故事

〔南〕米洛万·吉拉斯著

新华出版社

铁 托：
内 幕 故 事

〔南〕 米洛万·吉拉斯 著
柯 雄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2R44/119

铁 托:

内 幕 故 事

〔南〕米洛万·吉拉斯 著

柯 雄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08,000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203·010 定价: 0.6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美国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出版公司一九八〇年出版了《铁托：内幕故事》一书。作者米洛万·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一九一二——），为南斯拉夫作家、政论家，早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一九三五年起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仍为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任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南共六大后，特别是一九五三年以后，陷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发表文章，与南共中央的方针路线相对抗。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中央全会斥其为修正主义分子，吉拉斯旋即被免去党内外职务。两个月后，吉拉斯宣布退党，后曾两次被判刑，现居贝尔格莱德。

吉拉斯在本书里叙述了他跟铁托的分歧和决裂，着重写了铁托的为人、品格以及私生活。他承认铁托“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家”，“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是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就的政治家”；同时，吉拉斯也说，“我做不到无偏见”，因此在书中也对铁托写了不少贬损之词。但鉴于吉拉斯早年追随铁托，曾多年密切共事，书中所述铁托的许多情况实属“第一手资料”，是过去局外人所不了解的；吉拉斯在书中，也谈及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若干问题的看法，值得注意，有些段落对共产主义不乏诋毁之词，谅读者自能鉴别。

人集“天使”和“魔鬼”于一身，这一说法虽说平庸无奇，但却无法驳倒。如果认为这两者当中的哪一点是主要的，那就错了，或者是在欺骗自己。天使和魔鬼的成分常常合在一起；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互的作用，后者利用前者，而前者又为后者开脱。承认自己的本性的这一双重性的人，才能感受到胜利是最美好的。他可以本着他所承继的或者他所倡导的理论准则发挥这种双重性。

这一点表现得强有力和彻底，莫过于在政治中。政治决定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生活，是人类活动最充分最高级的形式。政治最高度地集中了生活。列宁对政治的看法受到经济占首要地位这种教条的影响，但是经济教条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可能是极权主义精神最强的政治家之一。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既不可能是天使，也不可能是魔鬼，对于他说来，政治是一种职业，不论这是一种更高的生活的力量强加于他的，还是他自身独一无二的创造性才能要求于他的。他越过这些过分简单化的“天使”或“魔鬼”的界

限，并不意味着政治家是超人。他不是超人。他不同于其他人的是，他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本能，这种禀赋其他人也有，不过少一些罢了。的确，政治家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从本能而言，他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如果他克尽职责地行使政治权力，如果他在胜败和生死的危急关头敢作敢为，手腕高明地处理问题，他就不可能是“天使”或“魔鬼”。

我认为这些想法并不新鲜。在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弗利之后，很难有人能就政治这个题目说出什么新的见地。我不打算谈理论。我在这里仅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知识谈谈。更确切地说，我只谈谈我对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看法。可以料想到，我将既涉及他的基本政治活动，也将涉及他的品格的基本方面。

我的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是跟铁托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最强有力的因素是铁托本人的品格。铁托是最完整、最复杂、最高深莫测的政治家之一。我认为，不仅在当代，也不仅在巴尔干这一狭小的范围内，人们都是这样看待他的。

铁托作为文学写作和政治评价的对象，他那动荡多变、光彩夺目的生活道路使他增色不少。他极好地表明了坚定的人格和独特的政治之间的联系。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私生活只有联系他的政治倾向才对我们有吸引力。诚然，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铁托的人格形成的相互关联的过程，既是富有教益的，也是令人神往

的，特别是因为他象征着民族共产主义的造反，象征着民族共产主义的异端。

我探索过这一象征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这促使我总结一下我对铁托的了解和我对他的感情。我不是偶然地或者无动于衷地这么做。我知道，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焦急不安地注视着，而南斯拉夫人则是忧伤地注视着铁托最后病况的戏剧性过程、他的去世以及去世后的情况。

首先，我与铁托的关系并没有了结。我们二十六年前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个人的种种联系并没有中断，虽然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断个人联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认为，我无愧于他。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我自己的信念，分析到头，也是由于我自己的缘故。但是，我必须承认，关于政治，我大多是从铁托那里学来的，当然，我不是他的信徒，也不是他的学生。通过铁托，我看透了政治和政治生活的实质。但是我反对幻想和奢望。我所追求的是开放的社会，个人享有自由，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多元主义。我所向往的是法律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法律。

可以有保留地把这看成是一种反面教育。这样一种教育——修改和重新调整我们对铁托的了解——可以成为运动和发展的基础。铁托身后的南斯拉夫在当代可能是重要的。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教育作用大体上——即使不

是根本上——是告诉我们如何有所不为。有所作为和进行创造，是根本教不会的。这么说，并不缩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意义；没有什么能贬低铁托或者他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件。生活和政治是无法约束的，它们日新月异，不断进行再创造，只要是不甘堕落，不陷于衰败的话。

这样的反面教育是奇妙的。这一点是铁托教给我的，虽然我只是在同他决裂以后才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一九五三年年底和一九五四年年初，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意识到，自觉地意识到，我得同他，同他的党决裂。否则，我就会失去自己的面目，在他的显赫权势下变成苍白一片。我不怀疑，当时我一心想着个人的命运，这使得我看不清楚铁托政治品格的真相以及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二

引人注目的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除了有政治才能以外，别无其他专长。他智力过人，才思敏捷，能够有选择地全神贯注思考问题。我发现斯大林也具备同样的特点。不过，斯大林考虑问题更加透彻（虽然稍微迟缓一些），并显示出一种更加敏锐更加全面的洞察

力。

铁托的长处表现在他逻辑严密，目的明确。当他有什么事情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对某个问题还没有想透彻的时候，他显得小心翼翼，甚至有些茫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通常只出现在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他常常想得快，说得慢，因此在公开场合他往往把两、三个句子并成一句话说出来，显得结结巴巴，含含糊糊。

铁托事实上并不擅长讲话，但是他决不限制自己公开露面的机会，更不用说放弃这样的机会了。作家拉多万·佐戈维奇在他还是共产党的一名高级官员的时候，有一次说了一句俏皮话：如果不给铁托讲话的机会，他会死掉。实际上，铁托正是通过经常向记者发表谈话和向听众发表演说来进行工作的；通过这些谈话和演说，他对事件作出反应，提出变革的倡议，从而提高他个人的威信，确认他作为一位不可或缺的领袖的作用。诚然，党支持他发挥这一作用，人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铁托本人也始终意识到，并精明地起着这样的作用，使得这种作用显得是生来固有的。

但是，当问题是具体的而且是尖锐地提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在党内发生分歧的时候，铁托懂得如何讲话来打动人心。他由于反对马尔科·尼凯集奇试图扩大塞尔维亚党内自由化倾向而发表的那次讲话（一九七二年，在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临时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是思想有条理、字斟句酌和巧妙说服的一个典范。

在他不得不就国内事务或外交事务作报告的那些公开的礼节性场合，他的表现最蹩脚。铁托的写作大体上也是如此：他的正式报告过于冗长，文句笨拙，而他就一些具体问题写的文章则条理清楚，明晰易懂，直截了当。

铁托受的教育是不足的。由于他上学不多，作为锁匠的学徒受的训练有限，只能是这样。但是他所知道的东西比杂乱的教育使他懂得的东西要多得多。我在监狱中偶然相识的所有工人共产党员中，以及在地下革命者中间，有许多人是很聪明的，但是铁托以其广泛的知识 and 敏捷的理解力而出类拔萃。他似乎什么都懂得一点，但是他内心是痛苦的，因为他对文学、艺术和哲学所知不多。

他还因手指伤残而感到痛苦；在他当机修工的时候，他左手食指尖曾被机器轧伤。这好象是他身上的一个标记，说明他的出身仅仅是一个工人而已。只有在政治上有利的时候，他才暗示他的出身是工人。甚至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也穿戴得象一个纨裤子弟，一九三四年，他加入一个登山俱乐部，他填的职业是电气技师。他伪造的身分证上说他是一名工程师。

在一般技术问题上，不只是在摆弄锁这样的事情上，他的手艺是很不坏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一名战俘在西伯利亚养病期间，曾操作一座蒸汽磨坊。三十年代初，他在克罗地亚的莱波格拉瓦蹲监狱时，管过发电站。在跟他一起参观工厂的时候，我注意

到，他对所有的机器和机械加工程序都不生疏，新东西特别引起他注意。他熟悉农业和农业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用党的基金在萨莫博尔买了一座葡萄园，战后又扩大了这座葡萄园，盖了一幢别墅，他让他哥哥住进去。在那里，他常常向我们详细介绍酿造葡萄酒的过程。

但是，除了他受过训练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不光彩的金属加工的手艺外，他的知识肤浅，没有什么深度。甚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是不足的。他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对于经济理论和历史则只有一星半点的了解。他是在监狱里，在莫斯科的党校里断断续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莫斯科的党校要求死记硬背，人人都得在会上表明自己是忠诚的。然而，有人对我说，在监狱里，铁托是一名自觉和出色的“学生”。

据我所知，战后，他没有劲头十足地读书，虽然说一句公道话，他的时间不多。他只是浏览一下标题，粗略地看一下新闻报道。但是电报、报告、南通社的《参考消息》，他看得很仔细。他对于小说不感兴趣，但对写小说的人反倒有兴趣。

他喜欢弹钢琴，甚至学会了弹几个简单的曲子。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弹钢琴是文化上有教养的一个标志。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他把这一点看成是他的特殊作用的另一个方面。他舞跳得不坏，稍显拘谨，

但却是优美的，通常是跳老式的华尔兹舞。

显然，铁托学语言并不费劲。战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一九四八年同苏联发生冲突之后，他英语掌握得相当好，足以阅读和理解比较简单的政治文章。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战俘学会了俄语的，虽然他看来从未透彻地研究过俄语。他常常把发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塞尔维亚文和俄文的单词混淆起来。不过，他的重音和发音还是很过得去的。他的听力和记忆力很好。他的法语很蹩脚，尽管他在巴黎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从事党的活动）。我认为，德语是他掌握得最自如的一门外语。我听过他用德语会话，但是我自己的德语很蹩脚，无法评价他的德语如何。

总的说来，他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说得最糟。他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时最大的错误是把克罗地亚的成语同塞尔维亚的成语混淆起来。还有，他的发音倾向于他家乡扎戈尔耶的方言。他经常应用俄语中的成语。他的公开演说只是更使人相信说他不是“我们的人”而是一个俄国人的谣言。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人听说，他没有费心思去学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甚至在晚年，借助于良好的记忆力，他仍然学得很快。我一九三七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拼音都不太确切，虽然他的语法是准确的，造句是条理清晰的、组织得很好的。他乐意接受别人的建议来改进自己的语言，除非这些建议损害了他讲话的含义。战后，我常常跟佐戈

维奇一起为南通社编辑他的讲话，小心地保留讲话的含义。铁托明白这样的编辑加工是必要的，但是他从来不让他不信任的人做这件事。我还记得另一个事例，可以说明他学得多快：战后，有一次，他用了“SINE QUA NON”^①这个片语，他使用得当，但发音错了。我指出了他的错误。他再没有重犯过。

根据我的判断和体会，铁托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赋。当然，我指的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才赋，作为一个杰出的司令官在作战中作出出敌不意和正确的决定，使人产生信心的那种能力。根据我战时的回忆，我一直对他作为一位战术司令官的军事知识和能力表示怀疑。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军事领导人也都持有这一看法，铁托知道这一点。一九七八年在奈雷特瓦河畔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他对这种看法，间接地也对我进行了驳斥，强调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曾在莫斯科刻苦钻研过军事战略。

跟铁托的大多数讲话以及半官方的传记中的说法一样，必须对这番话加以仔细的考察。首先，铁托在莫斯科呆的时间太短，他在共产国际里的工作太忙，对于军事科学至多只能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诚然，莫斯科党校的外国学员都得上战术课，但是这种教育是一般的和肤

① 拉丁文片语，意为“绝对必要的条件”、“必具的资格”。

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奥匈军队里当一名军士的经历要价值得多。这反映在他承认战争的恐怖，他对军事组织和军队实际生活有很深的感受。

不论他正规的军事知识的范围有多广，他不具备一位军事领导人的才赋。他常常草率从事，紧张不安；他对个人安全的考虑压倒了一切；他有时发布自相矛盾的命令。他有时不顾战况的进展，奇怪地下令调动大部队。

这么说是否太苛刻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在他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三次最大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暴露了这些缺点。这三次战役表明了一些失算和贻误战机的情况，而这些是一位比较镇静沉着、更为熟练的总司令本来可以避免的。

一九四一年秋季的德军第一次攻势的高潮是我们丢掉了以乌日采共和国闻名的解放区（以及塞尔维亚西部和中部的解放区），在此之后，极度的混乱和惨败使得铁托提出辞去党的书记职务。造成这次大失败的肯定还有别的因素。这次大失败使最高统帅部只带着不到两千游击队员撤离塞尔维亚。无疑，左翼的煽动，残酷的恐怖，“旧制度”残存的影响，都起了作用。但是最高统帅不能随机应变和缺乏远见，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德军第四次攻势（“白色战役”）中，特别是在一九四三年初春关键性的奈雷特瓦战役中，铁托不断改变命令。他过早地决定破坏横跨奈雷特瓦河的大桥，严重地妨碍了撤退，使得撤退复杂化。局势格外困难。尽

管有失误，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总的来说，这一仗仍然被认为是一个胜利，但是应该更多地把这归功于战场指挥官的足智多谋，而不是归功于最高统帅。

在德军第五次攻势（“黑色战役”）中，铁托一反他惯常的做法，迟迟不下决心。在那次攻势期间，我在别处，但是我听说，铁托显得不知所措，总想跟他的随从人员单独在一起。我在别的地方曾写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对于那些没有“等”他就进行了挽救败局的突破的领导人，他感到恼怒。

在这些战役中，铁托作为军事统帅是不相称的，这并不意味着铁托没有强有力地展示他作为政治领袖的品质。保卫乌日采的战役是一场灾难，但是乌日采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给我们本国的经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奈雷特瓦战役使我们国内的主要敌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①领导下的切特尼克分子^②遭到

①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一八九三——一九四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南流亡政府大臣、军队参谋长，并为反动民团组织切特尼克的头子，一九四一年投靠德意法西斯，与南共领导的武装部队作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被人民政权判处死刑。——译者

② “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之意，最初出现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系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为南王室所利用，变成了反动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切特尼克站在德意占领者一边，反对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其首领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译者

失败，他们再也无法恢复元气。这一仗使得铁托的新的游击队军威大振，并为盟国承认铁托和新南斯拉夫开辟了道路。苏捷斯卡战役是革命力量的意志对一支现代化军队取得的一次胜利，这一意志无疑是铁托的毅力和精神同我国人民容易发作的造反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再者，铁托很快就摆脱了失败和软弱。他没有去卖弄大道理，没有作多少自我批评，但却吸取了教训，增长了见识。好象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青春再生活力。

这些素质与其说是，与其说主要是一个军事统帅的素质，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领袖的素质。更确切地说，这是战时的一个政治领袖的素质。这恰恰是战时的铁托——显示了光彩夺目的政治才干。这种才干明显地表现为他确有把握地估计作战部队的实际能力，表现在他能够预期战争过程中的行动或反行动，而首先表现为他卓有成效地从政治上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工作。

甚至在战斗中，铁托也高度关心他的名声和权威。诚然，他的不在行的、常常是鲁莽的指挥肯定会损害他在党的干部和军队同僚中的声誉，假如他们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和精明的领袖的话。他懂得如何在适当的时机识别重要的和关键的行动方针。

我记得铁托在战术上犯过无数次错误，他有时匆匆忙忙作出反应，有时迟迟下不了决心。但是，我也记得，他多么明确地把握住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把这场战争看成是通过抵抗占领军而建立政权的一种新形式，

看成是通过把游击队改造成正规军来赢得胜利的手段和保证。

除了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塞尔维亚和黑山出现过左倾偏向这个错误之外，我回想不起，现在也说不上铁托还犯过什么大错误或可悲的错误，至于这里提到的那个错误，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但是由于铁托担任的领导职务，他让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方针，他必须承担责任。他意识到了这一偏差，他迅速使党走上了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他的迷惘和自相矛盾，他的虚荣心和自高自大，都成了次要的了，被人们所宽容，因为他是一个满怀信心地领导人民走向胜利，走向友爱和自由的新王国的领袖。他的弱点和错误不再为人记起，胜利的荣光似乎早在人们仍在为胜利作出牺牲的时候就是有保证的了。

什么是政治才干？什么是铁托的才干？政治才干是一种个人的素质，它只有在广泛的社会和民族背景之下才能得到发挥，即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它也只有有才华的集团之内才能得到发挥。领袖和运动，领袖和人民，是共生的，是相互结合的。你可以“无限地”探究这个问题；有学问的人和聪明的人已经在这么做。这里，我所谈的是铁托的一些并非是每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品格，但是这些品格使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或许是没有先例的成功。

这些品格就是：一种既是合理的，又是本能的强烈